

上 篇

基督教传韩的缘起与发展

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之传播与发展大致可分四个时期：^①

第一时期为门户开放之前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在朝鲜的初传。此时期，封建李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排禁基督教，斥之为“邪”教。韩国基督教会屡屡受难，基督教徒和西方传教士屡遭迫害和打击，但基督教屡禁不止。

19 世纪 70—80 年代，李朝被迫开港，允许外国人进入长期固守的国门，或经商，或投资，或兴办教育和医疗事业。在此形势下，新教传教士自美、英诸国（地区）乘机入韩，但由于缺乏宗教宽容条款，他们只好隐蔽地、变相地从事各种传教活动。至 19 世纪末年，基督教传教得到朝鲜官方的正式认可，此为第二时期，也即基督教

① 外国学术界对于基督教传韩的历史分期说法不一，观点分歧颇大。一种看法认为，可以 1945 年为界分近代与现代两大时期，其中近代又可分为形成时期（1884—1910 年）和日本统治时期（1910—1942 年）两个阶段。美国传教士克拉克（Allen D. Clark）的分期比较细，具体为：开始占据时期（1891—1897 年）、教会兴起时期（1897—1906 年）、教会复兴及成长时期（1906—1912 年）、成长时期（1912—1930 年）、神社参拜纠纷时期（1930—1945 年）、自由韩国时期（1945—1960 年）以及发展中韩国的教会时期（1960—1970 年）。韩国教会史学家 Chu Chae-yong 从韩国民众与基督教的关系角度划分，分期如下：接纳时期（1886—1896 年）、民众教会的形成时期（1896—1919 年）、非政治化时期（1919—1932 年）、巴比伦之囚时期（1932—1960 年）和重新觉醒时期（1960 年以后）。

上述诸家之言，均不同程度地揭示出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传播的实质性进展，颇有价值，然其分期理论过多偏重教会史。笔者综合诸说，立足于更宏观的视角，试图将基督教传韩与韩国的近代化历程结合起来考察，也即从近代韩国社会转型与嬗变的总体历史运动中看基督教传韩及其影响。

传韩的官方默认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基督教在韩国的公开传播及韩国教势的迅速成长和壮大时期，起自 19 世纪末年韩国政府宗教禁令的废弛，终于 1910 年前后韩国之被吞并。

最后一个时期是日据下的教会“受难”时期。此间，韩民族教会不断遭受日本殖民当局的压制和摧残，西方传教士在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夹缝中艰难挣扎。至 30 年代后期，韩基督教势力大为削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传教士被迫退出韩半岛。

第一章 潜入“隐士国”：基督教在韩半岛的初传

—— 东北亚的“隐士国”

韩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部，东濒日本海，西临黄海，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北枕鸭绿江、图们江与中国为邻，东北角夹图们江与俄罗斯接壤，自古以来，朝鲜族人便世代生息、繁衍在这里。近代以前，偏据东北亚一隅的朝鲜族人和国家还鲜为西方人所知，即便听说过也还不能正确地拼写出它的名字。^①步入近代以后，韩半岛的重要性日显突出，逐渐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它开始成为远东的心脏，其跳动牵动着方方面面。对中国而言，它是一面屏障；对俄国而言，它是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对日本人而言，它是通向亚洲大陆的桥梁。近代一个较长时期内，它是群雄角逐和大国争夺的场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现代的朝鲜战争均以为之战场。和平时期里，它又是东方文明扩散和文化传播的一条高速公路。通过韩半岛，佛教自西徂东传至日本。同样，以此为中介，不少西洋事物经由日本而进入亚陆。

韩半岛上的韩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自“檀君创世”算起，已历 4000 余年 即便从“箕子东来”算起 也有 3000 年以上的历史。公元 7 世纪，新罗统一朝鲜，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公

^① William E. Griffis. *Corea: the Hermit Nation*, 9th edition, London, 1911.

元 918 年，高丽王朝建立，标志着朝鲜中世纪的开始。公元 1392 年，李朝建立，相延 500 余年，直至 1910 年被日吞并。由于地理上的邻近及历史的关联，朝鲜的政治体制、法律、教育、礼仪、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佛教、老庄之学、儒学等相继传入并融入朝鲜的社会土壤之中。李朝开国后，排佛尊儒，儒学成为“朝鲜时代 500 年之国学”成为李朝“政治实践的理念、公私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术探讨的对象、社会价值观的中心”。^①与之相应，李朝统治者恪守与中华帝国间的宗藩关系，奉明、清为宗室，不与他国交往。这样，在以“小中华”自居的同时，封闭的朝鲜落了个“隐士国”的雅号。

历史上朝鲜曾经有过多种宗教信仰，但近代始终没有形成一种能够居统治地位的“国教”。^②儒学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信仰，还不如说是一个构建社会的政治理念及价值体系。儒家社会里，儒学和儒家教诲不仅是官方信条，而且是儒学社会一切臣民规范行为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佛教在韩国历史上一度有权、有势、有影响，甚至上升到国教的地位，但自从遭受李朝“排佛尊儒”的沉重打击、被命令严禁入城之后，其气数丧失殆尽。这以后，佛教僧侣以及佛教寺庙只得隐迹于山林之中，近似于国教的佛教也就此从韩国社会、尤其是政治舞台上消逝，然乡村之中笃信者不乏其人。在朝鲜民间，有一种广为流传、崇奉万物有灵、以多神崇拜为主要特征的神灵信仰，这就是“萨满教”。“萨满”信仰在韩国可谓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它盛行于全国各地，广大的、未曾受过教育的朝鲜中下层民众以及各阶层妇女，对其更是崇信有加。这种神灵偶像崇拜往往与祖先崇拜紧密相联，且始终未能超越民间宗教之属性。一言以蔽之，到李朝建立时，韩人社会既有的宗教信仰正处于

① 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 年 第 2 页。

② Isabella B. Bishop, *Korea and Her Neighbors, A Narrative of Travel . . . with An Account of the Recent Vicissitude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the Country.* N. Y. . 1897. p. 21.

崩溃瓦解的混乱之中。

这就是天主教初传时韩国的大致情况。

二 天主教在韩半岛的初传

天主教经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手传到南洋诸国及远东的中国和日本之后不久，就试图进入东北亚的朝鲜。^①1556 年到日本传教的耶稣会葡萄牙神父维诺拉（Gaspar Vilela）曾于印度果阿致函国内，言及“自日本海路三日程，有 Coray 之国”，并述及他本人 4 年前欲往该地，因路阻而未达。1611 年，在菲律宾传教的多明我会西班牙神父古昂（Dominico Kuan）被举荐为赴韩传教人选，虽曾筹划入韩但同样未果。^②

第一个将天主教传入韩境、同时也是第一个造访朝鲜的欧洲人，是“壬辰倭乱”时期随同侵朝日军前往的葡萄牙神父塞斯佩代斯（Gregorio de Cespedes）。1594 年春，塞斯佩代斯神父和一名日本天主教徒抵韩，在日军基督徒士兵中开展宗教活动。^③他们“主要以倭军将士为对象，但也向韩人传教，帮助可怜战争孤儿，给他们很多人施洗，但无法知道有多少韩人改宗和领洗”。^④法国天

① 关于天主教何时传入韩半岛有 3 种不同说法：第一种认为始于中国唐朝时期，时称“景教”；第二种认为始于中国元朝时期，即当时蒙古人所谓的“也里可温教”；第三种认为大约 16 世纪传入韩。有证据表明 16 世纪以前天主教已传入朝鲜，但总体而言它所产生的影响不大，因而笔者不拟深究。

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第 510 页。以及李相伯：《韩国史·近世后期篇》震檀学会第 394 页。

③ Horace N. Allen, *A Chronological Index, Some of the Chief Events in the Foreign Intercourse of Korea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ess of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Seoul, 1910, p. 4 据说，当时侵朝日军当中有 1.8 万名基督徒士兵。参见：George Paik,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Korea*.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9.

④ 金得视：《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第 229 页。

主教传教士、教会史家达雷认为，随军传教士根本无法接近韩人，因为韩人为逃避战乱纷纷迁往北方或隐匿山林之中。^① 朝鲜教会史家白乐濬论及此事时指出，塞斯佩代斯神父是以随军牧师的身份到韩国的，在韩逗留时间不长，前后仅两个月，且其活动范围局限于日本士兵，因此“对韩产生的影响不大”。^②

其后相当长时期内，未有欧洲人涉足韩土传教。不过，入韩传教的企图和努力一直未断。1614年，天主教在日本遭到弹压，耶稣会即以朝鲜布教为目的，遣韩人传教士权嘉兵卫回国，但权等待多年未能入境。^③1620年，明朝礼部尚书徐光启为阻止后金事上疏朝廷要求出使朝鲜。徐是基督徒，与在华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神父讨论了朝鲜开教事宜，并翻印《天主实义》等多种西教书籍以备朝鲜传教之需，结果由于明朝朝廷变更计划未能成行，徐、毕的朝鲜传教方案乃告吹。1650年，在中国北京的方济各会神父圣马烈（Antonie de Sainte Marie）搭船至朝鲜港口欲入朝鲜传教，无功而返。1707年，几名法国牧师自北京出发，前往中朝边境地区考察，想伺机进入朝鲜，未能成功。^④

基督教之传韩，赴明使节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中朝间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国王每年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派遣多批庞大的使团赴北京，正是通过往返两地的朝鲜政府使节团，当时被称为“天学”

① 达雷(Charles Dallet) 堪称西方学者中研究朝鲜天主教会的第一人。他于1874年刊行的两卷本《朝鲜教会史》(Histoire de L'Eglise de Corée)，系统全面地记述了自17世纪朝鲜天主教的发端至1866年为止的历史，是该时段朝鲜教会史的第一本力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后来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学者（如 H. B. Hulbert, James S. Gale 等）在写作朝鲜历史尤其教会传播史时，均无一例外地参考并引用达雷著述中的资料。

② 白乐濬：《韩国改新教史》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93年第26页。

据史料记载，该朝鲜传教士（汉名译作金万尚，又作 Caun, Vincent, Kaun, Gafioye, Kahioe, 1578—1626年）自1612年起滞留中国，伺机入朝，但逾7年而未成行，乃返回日本。最后于1626年6月20日在长崎被活活烧死。详见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耿升译，中华书局1995年第121—122页。

④ Allen, A Chronological Index, v. 4.

或“西学”的基督教被介绍到朝鲜。1610年，朝鲜儒臣许筠跟随使团来到北京，参观了新建的北京天主堂，带回《世界地理图》和《基督教十二端》加以研究。其后，赴明使节每至北京，必争相求得传教士有关天文、地理、历算、物理等汉文科学书籍和基督教教理、文学等书籍。1631年，陈奏使郑斗源自北京带回大量书籍、地图和西方工艺品，其中包括利玛竇 (Matthieu Ricci) 的《天主实义》。当时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性理真诠》和《七克》等基督教教理书亦先后传入朝鲜。

西书传入朝鲜初期，朝鲜士林并未十分在意。一直到1777年，才有丁若铨等少数知名学者对西洋书籍中宣扬的新教义产生兴趣。正祖时期，对天主教教理的研究渐盛，“西学”逐渐地显示出宗教的面目。著名学者丁若铨、权哲身等人不仅热心研究教义，而且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发，进而走向信仰实践。

1783年冬，李承薰跟随作为冬至使书状官的父亲出使北京。在京期间，李承薰皈依天主教并接受洗礼，得教名彼得 (Peter Yi)。在华传教士希望他像使徒彼得一样，成为朝鲜教会的第一块“基石”。1784年春，李承薰回国，从此，天主教正式传入朝鲜。

天主教是在西方传教士尚未进入韩境的情况下，由韩人自主传入朝鲜的。对韩国思想文化史颇有研究的台湾成功大学教授蔡茂松指出，在没有圣职者入国传教的情况下，韩人自发地建立了教会，堪称“世界传教史上之一特色”。^① 李承薰回国不久，便吸纳两班子弟权日身和李槩入教，并为其主持洗礼。此后，三人全力以赴，投入布道。早期入教的人多属两班阶层，也有少量来自中人阶层和常民。在信徒达到30余名的情况下，李槩等人创立了朝鲜教会。初期，朝鲜教会模仿北京教会，推举主教和神父，建立假圣职制，巡回各地传教，主持洗礼和祈祷仪式。1792年，朝鲜被置于北京教区管

① 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第523页。

辖之下。两年后，中国神父周文谟（James Chu）受北京主教汤士选（Alexandria de Govea）之命赴朝，成为第一个人朝传教的神父。此时，朝鲜天主教徒约有 4000 余人。^①

朝鲜教会创立伊始，社会上对信教者的怀疑和迫害随即发生。

“参与教会活动的人，以教友互称，他们开始进行打破传统的严格的阶层制度及一夫多妻制，并以韩文作为祈祷文，展开韩文专用运动，颇有输入西洋文物门户开放之势。”^②教会的这种活动，有悖于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逐渐引起现存体制维护者的关注。1785 年发生了“乙巳秋曹摘发事件”。是年 3 月，朝鲜天主教会为刑曹禁吏所发现，数位教人被捕。史料记载如下：

前中人金范禹家，有李槩者，以青巾覆头垂肩，主壁而坐，承薰及若铨、若镛三兄弟及权日身父子，皆称弟子，挟册侍坐。槩说法教诲，比之吾师弟之礼尤严，约日聚会，殆过数朔，士大夫、中人会者数十人。秋曹禁吏，疑其会饮赌技，入见则举皆纷面青巾，举止骇异，遂捉其耶稣像及书册物种若干。

早期入教的信徒当中，两班子弟为数众多。主司本案的刑曹判书认为他们系一时失误而入教，于是加以训诫，然后释放，并将没收的耶稣像退还给他们。案件中提供集会场所的金范禹（教名 Thomas Kim）是中人阶层译官，受到重刑入狱后被流放至一荒岛，其受到指控的罪名是焚烧祖先牌位。不久，金范禹因刑讯致伤

格里夫斯在论及朝鲜教会创立仅仅 10 年间，基督教教义就得到如此迅速传播的原因时，将其归结为与韩民族的习俗有关，即韩人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房间朝街面开放，不管是友人还是陌生人，熟悉的人还是不熟悉的人，都可以入内谈论时事，或作听众，没有什么秘密可保留，加上韩国又是一个热衷于闲聊的民族（原文为 a nation of gossips and loungers），因而任何消息、或者某种新思想，得以像草原之火一样蔓延。

蔡茂松前引书，第 522 页。

李晚采：《辟异编》第 2 卷，第 1 页。转引自蔡茂松前引书，第 528 页。

而死，成为朝鲜第一个由于信仰天主教而献身的殉道者。^①

摘发事件发生之后，李朝政府深以异学邪说为患，乃下令禁止天主教，同时严令备边司和地方官府严查、严禁异端杂书流入，以绝祸患。“至于书册，则我国人家溢宇充栋者，无非唐本，虽于已出本耽看，足为该洽，人亦足为文章，士更安用多购乎。最所可恶者，所谓明末清初文集及稗官杂说，尤有害于世道。”^② 朝廷还下令赴北京使节不得与清人交游。在朝鲜政府的严厉打击下，一些信徒产生了动摇。朝鲜教会成立初期的骨干之一李檠否认其信仰天主教，李承薰迫于压力也不得不撰斥邪文而一时背教。1786年对天主教的弹压趋向缓和，李承薰等人“起而开展教会再建运动”。

1790年5月，北京主教汤士选告诫朝鲜教会秘密派来的特使：祖先祭祀有悖于基督教教义，应予禁止。这一决定，给新生的朝鲜教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成为18世纪末年至19世纪初年基督教惨遭官府迫害的重要诱因。1791年12月，全罗道珍山郡两名基督徒尹持忠（教名 Paul Yun）和权尚然（教名 James Kwon）被处死刑，原因是尹氏在母亲去世后不设神主、不祭祀，并且拒不放弃邪教信仰，是为“珍山事件”。珍山事件消息传出，反对天主教的儒生频频上疏，要求朝廷严惩天主教。结果，各地展开搜捕行动。权日身因重刑发配病死途中，李承薰被解除现任官职，其他一些被捕教徒或背教，或遭流放，或死于狱中。这一年是辛亥年，教会史上称之为“辛亥教难”。

1794年底，周文谟神父夜渡鸭绿江，潜入朝鲜。北京主教汤士选在任命周神父时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他意识到，在当时朝鲜传教特别困难的情况下，由一个通晓汉文且外貌特征类似于朝鲜人的中国神父担当朝鲜教会圣职，远比欧洲人合适。事实证明，这种

① Charles Dallet. *Histoire de L' Eglise de Coree*, Vol. 1, p. 27

② 《李朝实录·正祖实录》第24卷，第34页。

考虑堪称老谋深算。周文谟神父抵达朝鲜后，一直秘密地从事布道活动。翌年 5 月，一个名叫韩永益的背教信徒告发了他，朝廷下令缉捕。此后 6 年间，周文谟成功地隐迹、藏匿于汉城寡妇姜完淑家的柴房里。当时的朝鲜社会，等级森严，男女之间有着极其严格的性别界线，一般情况下，人们根本不会想象得出寡居在家的姜完淑会有如此勇气和胆识，会做出如此惊世骇俗之举！

就在周神父藏匿的同时，朝鲜官府对基督徒的迫害持续未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1796 年 9 月，周神父为避人耳目，以拉丁文修书一封，借朝鲜赴京使团出使之机安插两名韩人文员同行，嘱其伺机转交北京主教。在这封信里，周神父建议葡萄牙国王派遣使节赴朝，签订修好条约，保证信教自由。信函平安送达目的地，但未能产生预期效果。1800 年，李朝政府变更，年幼的纯祖即位，大王大妃金氏垂帘听政，朝廷中得势的党派趁机鼓动金氏禁教，以便借机削弱敌对党派的势力。次年初，政府颁令禁教，并施行五家作统之法严厉搜捕信教者，迫害持续至 9 月，被捕罹难者不计其数。这一年是朝鲜基督教史上的黑暗时期，史称“辛酉邪狱”。周神父确信迫害因其而起，乃挺身而出前往官府自首。1801 年 5 月，周被斩首，帮助隐匿的姜完淑亦遭杀身之祸。

出乎周文谟神父意料的是，对基督教信徒的迫害没有因他的自首以及被处决而平息。其后不久突然发生的黄嗣永“帛书”事件，恰似火上浇油，使得官府之迫害行径更趋激烈。

黄嗣永，1775 年生，是两班阶层丁若铨三兄弟中最年幼者丁若铉之婿。丁氏兄弟很早就加入天主教会，受姻亲关系之影响，黄嗣永随从丁氏家族入了天主教，并一度协助周文谟神父传教。1798 年以后移居汉城，负责指导教理班，并负会长之责。辛酉迫害开始后，他避居庆尚道和江原道等地，最后遁入忠清道堤川郡一山洞之中。经一番思索之后，黄嗣永拟就一封致北京主教汤士选的信函，内中记述了自 1791 年辛亥迫害至 1801 年辛酉迫害之间朝鲜政府

对天主教之弹压情形以及各殉教者之简要情况，并提出下列建议以发展朝鲜教会：

第一，鉴于朝鲜教徒生活困苦，乞求西方诸国捐资“以为东方扶持圣教，救济生灵之资本”。

第二，遣朝鲜人一人入北京天主堂，“教年少相公们以东国言语，以备后日之用”，同时请“中国教友热心谨慎者一人移家于栅门之内”开设店铺接待行人以利往来通信。

第三，请教皇致书清朝皇帝，命朝鲜接受西方传教之人。

第四，请说服清朝皇帝，合并朝鲜，属宁古塔，令新王监督朝鲜。

第五，建议以朝鲜宗室女嫁清帝为国后，以利传教。

第六，请西洋基督教国家出“海船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利害之兵器”兵临朝鲜，迫朝王接纳传教士。

这封写在素帛之上的“帛书”，宽三十八公分，长六十二公分，白色绸料，毛笔正楷细书，共一百二十行，一行百十字，一万三千三百十一字”。^②为躲避边防检查，“帛书”被缝在信使的衣服夹层中，但还是被查获。1801年9月，黄嗣永被捕入狱，11月份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处极刑，尸体被切成六块分送各道示众。

黄嗣永“帛书”事件之发生，使朝野上下大为震惊。由于这一事件，朝鲜官方从此可以冠冕堂皇地宣称，基督教不仅是异端邪说，而且确实祸国殃民，黄嗣永“帛书”便是明证。既然基督教是祸国殃民的异端邪说，那么严厉查禁当在情理之中。韩国广大民众尽管并非完全按照这一逻辑去思考，但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由此而微妙地改变了对基督教的看法。“帛书”事件之后，紧随而来的是更严厉

① 黄嗣永：《帛书》。转引自蔡茂松前引书，第532—534页

② 蔡茂松前引书，第530页

的禁教措施和一场更为残酷的迫害……辛酉迫害（亦称辛酉教难）。辛酉教难中究竟有多少教徒遭受迫害致死，又有多少信徒残存下来，均无可信资料为据。有人估计被杀殉教者达 300 余人。实际上，几倍于此的教人遭到逮捕拷问，有的忏悔背教而获释还，有的则身陷囹圄之中，还有的则背井离乡，隐姓埋名。毫无疑问，辛酉教难使朝鲜教会惨遭打击，“多达万人之众的天主教会似乎刹那间销声匿迹，不复存在”。其后十余年间，天主教徒一直没有公开活动，直至 1811 年以后，才有一些信徒鼓起勇气致书北京主教，恳求伸出援助之手，或向罗马教廷呼吁求助。^①

然而 19 世纪初的欧洲正蒙受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剧烈震荡，天主教势力在欧洲受到冲击，北京的天主教会也被大革命剥夺了一切物质上的援助，且天主教在中国正遭到排禁和严厉迫害。凡此诸端，使得朝鲜的天主教会未能得到来自外界的任何援助，朝鲜教会被迫默默承受着来自官方的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和打击，其中包括 1815 年的乙亥教难、1819 年的己卯教难和 1827 年的丁亥教难。

1829 年，早已在远东开展活动的巴黎外邦传教会从革命和战争的冲击中复苏，重新恢复其传道事业。1831 年，新任教皇格利高里十六世宣布朝鲜教会脱离北京教区，成为独立的朝鲜教区，并任命当时正在泰国曼谷的布鲁吉埃（Barthelemy Brugiere）主教为朝鲜第一任主教。布鲁吉埃主教尚未进入韩境就在中国病逝，其同事罗伯多禄（Pierre Philibert Maubant）神父于 1836 年冬越过冰封的鸭绿江悄悄潜入汉城。次年冬，郑牙各伯（Jacques-Honore Chasten）神父加入罗伯多禄神父行列。1837 年，罗马教廷任命在中国四川传教的范世亨（Laurent Marie-Joseph Imbert）神父为朝鲜教区第二任主教。范神父于年底越过中国东北边境进入朝鲜。从此，朝鲜天主教会始有主教。

^① Horace Allen, *A Chronological Index*, p. 4

朝鲜教区组建后,教势的恢复和发展迅速,至 1839 年初教徒增加到 9000 余人。然而这年朝鲜政府又发生变更,政权落入敌视天主教的赵派势力之手,旋即颁布新法令,严厉搜捕和惩罚天主教徒,新一轮迫害出现。范世亨主教认为迫害乃针对西洋人,于是前往自首并要求郑神父和罗神父亦效法而行。是年 8 月,3 人被处决。此次教难(己亥年教难),韩人天主教徒遇害者达 118 人。^①新生的朝鲜教会再次处于无圣职者管理之状态。1843 年,费雷奥(Jean Joseph Ferreol)被任命为朝鲜主教,即所谓高主教。高主教试图从珥春渡图们江入韩,未果。1845 年 10 月,高主教与安神父(Daveluy)从上海经海路偷偷潜入韩境。此后,西洋传教士经此航路陆续入韩,至 1863 年,在韩西洋传教士已有主教 2 人,神父 8 人。^②韩人信教者也逐渐增加,1850 年有 11000 多人,1855 年有 13600 多人,1860 年有 18000 人,1863 年达 20000 人。^③

1840 年至 1865 年的 20 余年间,是远东地区的多事之秋。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港,日本于“黑船事件”后与美国签约。1847 年,法国军舰驶近韩国海域,追究范世亨神父等 3 人被害之事。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进一步对欧美大国开放,泱泱‘天朝大国’威望扫地。此间沙俄之领土也不断东扩,直接与韩边界相接壤。所有这些给朝鲜王朝的统治者带来极度的恐惧和不安。正在此时,李朝内部又发生新的变更。1864 年李朝延续 470 余年的王位直系传承因无嗣而中断,被迫从旁支择立新君。结果,12 岁的高宗继位,其父兴宣大院君摄政,这一事件标志着对天主教实行严厉迫害政策的党派再

① 据达雷《朝鲜教会史》估计,被害教徒为 200 余人。

② 白乐潜:《韩国改新教史》第 35 页曾被朝鲜国王任命为朝鲜宫内府赞议官的美国人山岛(W. F. Sanders)认为:1863 年有主教 2 人,神父 10 人。详见:W. F. Sanders, *Undiplomatic Memories*, New York, 1930, p. 89.

③ 柳洪烈:《韩国基督教史:天主教史》,韩国文化史大系 IV 宗教·哲学史,高丽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 1978 年蔡茂松前引书,第 546 页 Allen, *A Chronological Index*, p. 6 山岛认为,1863 年朝鲜天主教徒达到 25000 人

次得势，也预示着朝鲜天主教新灾难的降临。

在大院君对天主教采取打击行动之前，发生了俄人叩关事件。1866 年 1 月，俄国军舰驶抵元山港，致书朝鲜宫廷要求通商和定居自由，并扬言若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实施武力。朝鲜宫廷恐慌无措，遣使至北京商讨对策。这时，一些天主教徒认为此乃赢得宗教宽容的最佳时机，乃进言大院君说：抵御俄国入侵的最有效措施在于朝鲜与法国、英国结成反俄同盟，这一同盟可借助在韩国境内的法国主教居中撮合实现。大院君走投无路之际，一度考虑与法国主教会面，但恰巧主教外出布道不在汉城。当法国主教赶回汉城等待召见时，大院君改变了初衷。促成大院君改变想法的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俄国军舰在炫耀一番武力之后不见回音，主动驶离元山港；第二，朝鲜赴北京特使发回汉城的函件使得朝鲜政府误以为中国正在严厉弹压西洋人；第三，朝鲜政府中有 4 位老臣强烈反对大院君与法国神父会晤，主张严厉执行排教法令。^① 结果，宗教宽容未能获得，反而由于暴露了法国神父在韩行迹而招致新的迫害。

1866 年 1 月 12 日，大院君发布禁教令，在全国展开一场对天主教徒的大屠杀。这次行动不仅针对外国传教士，而且矛头指向一般的韩人信徒，数月之内，遇害教徒达 8000 余人。在朝鲜境内的 12 名神父除李福明神父（Ridel）、权神父（Feron）和姜神父（Calais）三人幸免于难外，全部遭杀身之祸。这便是韩国教会史上的“丙寅教难”。

大院君摄政十年间，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攘夷政策。“丙寅教难”之后，法国远东海军屡次前往朝鲜海域，兴师问罪。其后又有德意志商人欧佩（Oppert）传书朝鲜地方官员要求通商未果之后盗掘大院君父亲南延君之墓一事发生。美国商船“谢尔曼号”强行驶入大同江后导致船毁人亡，直接诱发了几年后美国亚洲舰队进驻江

① 参见白乐瀚前引书，第 38 页。

华岛海面的“辛未洋扰”事件。这一切，更加坚定了大院君闭关自守、严厉弹压天主教的信心和决心。1873年，敌视天主教的大院君失势，政权转入闵妃戚族。1876年2月，日本借口“云扬号事件”迫使朝鲜签订“丙子修好”条约，同意开港通商。然朝鲜政府的禁教政策未变，一如从前。在此情形下，新任命的朝鲜教区主教李福明及巴黎外邦传教会的神父只得潜入韩境，小心翼翼地开展布道事业，直至80年代朝鲜对欧美诸国开放以后才逐渐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

综观天主教传韩之最初百年史，可以初步得出两点结论性看法：其一，天主教是在朝鲜尚未开港、尚未颁布“宗教宽容”条例的情况下，自中国传入韩半岛的。由于传统的和现实的原因，封建李朝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视天主教为异端邪说，加以弹压严禁。因此，天主教传韩后屡遭挫折，屡经迫害，但屡禁不止。

其二，天主教传入朝鲜的最初百年之所以屡遭迫害和打击，有着多方面的背景和原因。一是天主教教义凸现出来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及其信徒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与韩人儒家社会的规范有着强烈的反差甚至对立。例如儒家社会特别强调男女有别、交往有度，所谓“男女7岁不同席”，其显著社会表征之一就是女子在陌生人面前绝不能轻易露面。相形之下，西方社会就没有这种严格的价值观要求，相反，倒是追求平权成为一种时尚和传统。对他们而言，男女平起平坐、出入相随，乃至一同劳作，均为情理中之举。遑论教会当中男女信徒同室颂经、同声祈祷之授受不亲。由于祖先崇拜问题而引发的“礼仪之争”，也同样反映出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对立。

天主教屡遭迫害和打击的又一背景是，天主教传韩往往同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力入侵和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朝鲜尚未开港的时候，西方传教士便借助本国海军的坚船利炮多次闯关。当法国传教士不顾朝鲜政府禁令潜入传教而遭到弹压时，他们同样求助于其政府驻外海军，后者公然多次耀武扬威地闯入朝鲜海域兴师问

罪。入韩后，传教士们也未能妥善处理与韩官方的关系，未能教导韩人基督徒摆正信仰基督与爱国家的位置，以至于屡屡触犯法律。面对弹压，某些基督徒甚至不惜出卖国家，黄嗣永“帛书”事件即是一例。这种情况，很容易促使朝鲜政府将西洋传教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将韩人基督徒视为出卖民族国家利益的败类。这一点恐怕也是百年中天主教惨遭厄运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天主教之传韩，过度卷入了朝鲜政治的漩涡之中天主教牧师在向朝鲜社会传播基督教信仰时，总体上走的是上层路线而不是面向广大的劳苦大众。他们忽视了宗教“经典”之传授，寄希望于知识阶层乃至统治者。自 1784 年李承薰首创韩国教会至“丙寅教难”的 80 余年间，天主教神父从未试图翻译发行任何福音书或圣经篇章，这一点从根本上不利于基督教信仰之传播，阻碍了韩国天主教教势的发展与扩大。与之相关，天主教传教士们过度地将他们的传教“使命”绑在了朝鲜政治的战车上，这就难免其屡屡成为韩国政治斗争和党派倾轧牺牲品的命运。

三 新教传教士与朝鲜的早期接触

在天主教传韩过程中，基督教另一大宗——新教也开始了与韩人的初期接触和交往。

最初将新教传入韩半岛的是荷兰人。仁祖五年（1627 年），荷兰舰船“奥得凯勒号”（Auderkeres）因风暴偏航至朝鲜海岸，韦特里（Wetteree）等 3 人奉命登上济州岛（Quelpart Island, Cheju Island）寻找可供饮用的淡水，结果被当地韩人俘获，被迫留居汉城。韦特里后来改名朴燕，娶妻生子，颇受朝鲜宫廷宠幸。^①作为基

^① Allen, *A Chronological Index*, p. 2. 又见金光洙：《韩国民族基督教百年史》，韩国教会史研究院 1978 年版，第 17 页

督徒，韦特里与另外两人曾有意无意地传播过基督教教义。

孝宗四年（1653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斯佩维尔号”（Sparwehr 在济州岛海岸触礁 乘员一行 64 人中 36 人为朝鲜官宪搭救。这些人“受到程度不同之善待，但处于严密监视之中，不准离开”，只好在丽水、顺天、南原等地居住下来。^①以哈梅儿（Hendrick Hamel）为首的 8 人逗留 14 年后逃至日本长崎港，辗转回到阿姆斯特丹。哈梅儿后来写了《漂流记》，向世人诉说了这番非同寻常的经历。^②据说，这些荷兰人都是新教徒，人们推测他们曾向韩人传播过基督教教义，但人们至今也不知道他们传播福音的痕迹”。^③

带着传教目的最先赴韩的是日耳曼传教士郭实腊（Carl Friedrich Gutzlaff）。郭曾服务于荷兰传教会，1828 年与其脱离关系到了曼谷，后来移居澳门。1832 年，郭搭乘英属东印度公司船只“阿默斯特勋爵号”（Lord Amherst）北上，该船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商业考察。在初步勘探了中国北方沿海口岸之后，阿默斯特号自山东启锚转航朝鲜海域。先是停泊在黄海道西岸长山角群岛附近，然后南下抵达忠清道西海岸。这些西洋“不速之客”每至一地，便向当地官员提出开港通商的要求。在得到“无权做出答复”的回答后，他们又递上随身携带的礼品若干，嘱地方官员将其与通商请求书一起呈送朝鲜国王，然后耐着性子等待来自朝鲜宫廷的答复。就这样，阿默斯特号在朝鲜西海岸前后逗留一个多月。期间，郭实腊等人向当地居民散发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还有药品和植物种子。郭实腊是受其好友、当时在中国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

① Allen 上引书 第 4 页。金光洙前引书 第 18—19 页。

哈梅儿的《漂流记》（Narrative of an Unlucky Voyage and Shipwreck on the Coast of Korea）问世后被译成法文、英文和德文在欧洲广为流传。格里夫斯称该书之记述“古怪且有趣”（quaint and racy）。详见：W. E. Griffis, *Corea, Without and Within*, 2ed. . . p. 36.

③ 金得视：《韩国宗教史》第 277 页。